

三名日本“中国通”与“华北分治”

齐福霖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进而向华北侵略。其侵略华北的策略，包括军事、外交、经济三方面，“华北分治”政策，就是军事与外交相互为用的典型。关于日本侵略华北，有的论者认为，关东军是主谋，策源地在东北沦陷区。^①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主谋是日本政府，策源地在东京。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负责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前线指挥所，而日军三名“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多田骏、土肥原贤二则担当了推动“华北分治”的急先锋。本文拟具体揭露板垣等三人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来剖析日本分治华北的一系列罪恶阴谋。

板垣征四郎首先策动

板垣征四郎1885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历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中国边防军参谋，云南、汉口、奉天（今沈阳）等处特务机关长及公使馆副武官，足迹遍及中国各地。^②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与石原莞尔等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升为陆军少将，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他并不以侵略中国东北为满足，又把手伸进华北。1933年2月13日，板垣奉派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任特务机关长，“目的是发动北京政变”。^③

① 佟冬、解学诗：《华北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汪伪外交部亚洲司研究室：《日本时人辞典》，中央电讯社1941年版，第145页。

③ [日]吉野直也：《天津军司令部》，图书刊行会1989年版，第197页。

板垣到津策划分治华北阴谋时，正是关东军向热河与长城以南地区侵犯之时。关东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和5个长城关口，并继续向长城以南地区进犯。^①板垣乘关东军关内作战之机，积极策动“华北分治”。他把华北的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他认为，只要采取适当手段，后三派及北洋军阀的残余均可以收买过来，通过这些势力排挤蒋介石集团在华北的势力，然后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由日本操纵的华北傀儡政权。^②为此，他要求关东军以军事行动进行支援。4月11日，天津特务机关电关东军参谋长：“我们发动的时间打算在本月20日稍前。发动之前，贵军的战场追击部队如撤回长城一线，会给工作带来坏影响，请务必不要表现出将从最前线撤退的态势。此外，古北口方面对中央军的攻击望能于本月15日至20日之间进行。”^③恰在此时，英美两国对关东军进犯关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日本天皇因恐日军越过长城进犯河北省将引起国际纠纷，诘问日军参谋次长真崎甚次郎，于是19日武藤司令官命令关东军返回长城线。^④关东军虽然没有依照板垣所希望的时间发动进攻，但仍然在21日开始对古北口发动攻击，并占领了八道楼子等高地。^⑤24日，天津特务机关致电关东军参谋长表示感谢，说：“贵军攻击古北口，为实行施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关东军为配合天津特务机关的谋略，于26日以副参谋长（因参谋长正在赴东京途中）出面向日军参谋次长申述了以下意见：“在平津地方建立非蒋介石的地方政权，使之停止对‘满洲国’的直接与间接的策动，特别是停止对热河省境内的军事行动，是关东军最为希望的。我们认为，为此推举段祺瑞或拉出阎锡山，

① [日]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史》，青木书店1986年版，第61页。

②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③④ [日]小林龙夫等：《现代史资料》，三铃书房1964年版，第7卷，第529—530、531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辑，第69页。

均无不可。但由于在天津的措施进展迅速，所以当前是否立即更换谋略目标，有慎重考虑的必要。我们认为，对华北形势暂时静观，着手天津特务机关的计划，较为适当。”^①

上述关东军的意见是，不管首领是谁，一定要建立亲日政权，并大力支持天津特务机关的谋略。军部也由参谋次长对华北驻军做了指示。5月6日发出《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继续以关东军的威压为基本方针，以与此相呼应的华北谋略为手段，使目前华北官宪实际上屈服或瓦解，迫使‘满洲’与中国交界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宁。”其要点是：“对于策动中国方面停战，仍然要内外各方面态度一致，坚定不移，同，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采取进一步促进分立倾向的政策。”^②从这个方案可以看出，军部这时也指望依靠关东军作战的压力，来配合天津特务机关的谋略。

当时天津特务机关的谋略是：鼓动宋哲元、张作相、张敬尧，以张敬尧在北平举行武装政变为导火线，用旧军阀军队占领北平，建立亲日政权，推举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出台。同时，还企图编成石友三傀儡军。^③板垣对张敬尧寄予很大希望，他认为张敬尧是真心实意的亲日派，想从日本要回1920年任湖南省督军时购买武器的定金，因此利用张可以运动在关内与日军交战的宋哲元倒戈。^④根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吉郎的调查，截至1933年5月止，板垣已耗资300万元的活动经费，此等费用均系由日本陆军省机密费项下开支。^⑤

然而，天津特务机关的谋略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段祺瑞为了避免板垣的纠缠，于1933年2月1日自天津迁居上海。^⑥5月20日，段祺瑞致电王揖唐、陆宗舆等人说：“余养疴于上海，不问世

①②③⑤ 《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534、536、543、568、553页。

④ 《天津军司令部》，第198页。

⑥ 吴廷燮：《合肥段公年谱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卷下第30页。

事。日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为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之地方当局，严加制止。”^①他不愿参与板垣阴谋计划。同样，吴佩孚、孙传芳也不理会板垣的要求，张敬尧拿了板垣30万银元，潜往北平从事非法活动，5月7日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被中国爱国人士所刺杀。^②这件事使得板垣物色的其他人物闻风丧胆，更使得天津机关的谋略迟迟不得进展。5月21日，天津特务机关在给关东军参谋长的电报中也不得不承认，对华北谋略困难很多，进展不大，原因是：“（一）缺乏足以号令华北的中心人物；（二）反蒋派并非就是亲满亲日派；（三）中央政府的权威很大，反对派多犹豫观望，缺乏勇气。”^③到了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板垣遂不得不暂时停止“华北分治”的策动。

多田骏公开鼓吹“华北分治”

多田骏也是侵华日军的重要将领。他1883年出生于日本宫城县，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进入军界后，以袁世凯、黎元洪总统的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为师，任他们的助理官。^④九一八事变前，他曾两度被聘为中国陆军大学的教官。伪满洲国成立后，任伪满洲国军队第一任最高顾问，1935年7月22日接替梅津美治郎任日本华北驻屯军第23任司令官。^⑤

梅津的调任与推进“华北分治”政策进展缓慢有直接关系。关东军在1935年1月在大连召开驻华各地武官及关东军幕僚会议，决定了积极推进“华北分治”的政策，而梅津对此政策执行不力。日本军部中强硬分子素嫌梅津对华态度软弱，因此才调多田骏任驻屯军司令官。据载，8月19日，多田到津后立即分析情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9辑，第89页。

② 《天津军司令部》，第199页。

③ 《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568、553页。

④ [日]森松俊夫：《军人们的昭和史》，图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⑤ 《天津军司令部》，第204页。

况，认为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和保定的商震。通过某些方法，把这四个人掌握起来，使之互相合作，便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①多田“已经分别对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等进行了试探。多田对宋哲元等四人提出方案：“由你等四人同意，与满洲紧紧握手，可以成立一个新的政权。如果成立了新政府，华北就会很快繁荣起来。万一和蒋介石有了磨擦，日本将充分支持新政权，请不必为此担心。你们是否有意建立一个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中立政权？”但回答却如出一辙：对于建立一个中立政权都大为赞成，并且都表白自己并不排日，对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还可以给予帮忙；对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的话，自己一定充分合作。多田根据这些答复，认为新政权很快就能成立，然而，事实上却没有取得进展。他感到这些实力派人物使用了一套八面玲珑的手腕，当“只有一个人在场时，他回答得很爽快肯定；要是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在场，他们就会采取‘你如果干，我也干’的观望态度”。^②

多田用秘密拉拢未见成效，就转而采取公开的鼓动。9月20日，多田在其天津官邸，召集平津的日本新闻记者聚餐，发给题为《对华之基本观念》的小册子。^③小册子公然鼓吹反对国民政府，妄称要把华北建成“中日两国人民共存共荣的乐园”。

随后，多田又于9月24日在日本新闻记者聚餐会上鼓吹：“逐渐使华北形成日‘满’华并存的基础”，“为了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而行使武力，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我军对华北态度有以下三点：（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

^{①②}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秘录土肥原贤二》，芙蓉书房1972年版，第284—285、285—286页。

^③ 《时事月报》第13卷第4期，“国内时事”，第157页。

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建立华北政治机构；总之，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①

多田以《对华之基本观念》的小册子及谈话的方式，宣布了日本分治华北的方针，要成立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并不借用武力使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当9月25日日文报纸《京津日日新闻》刊出这个声明及小册子的大部分内容后，引起了极大反响。中国各界爱国人士无比愤慨，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提出交涉。日本政府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及国民政府的质问下，不得不进行掩饰，说什么“该小册子不足代表日本之意见，仅系多田个人所交付参考之小印刷物”。日本外务省也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表示：该小册子并非代表其本国政府及军部之意思。^②

事实上，日本军部及内阁正决定加速“华北分治”的策动，而多田的言论不过是过于公开的表露而已。就在多田小册子发表的同一天即9月25日，日本陆军省发言人表示：“日本陆军以武力驱逐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权于华北之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还宣布了陆军对华政策的三点意见：“（一）驱逐华北的反日反满分子，（二）华北在经济上脱离南京，自行独立，（三）经由华北五省军事的合作，以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③9月29日，刚从内蒙返回沈阳的土肥原，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会商后也发表谈话：“组织一个包括华北五省在内的自治政府将可帮助恢复和平与秩序。”^④

多田的分离华北言论，不仅反映军部侵华激进派的思想，而且也得到了陆军大臣和日本内阁的支持。9月4日新上任的陆相川岛义一一直积极支持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侵略华北的阴谋活动，他

① [日]秦都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1年版，第56—57页。

② 《时事月报》第13卷第4期第157页。

③ 《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98页。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1辑第143页。

综合了陆军各方面的意见，拟定了《鼓励华北自主案》。9月28日，川岛将此案带到内阁会议上。是日川岛违反常例，亲携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冈村宁次、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出席，气势汹汹，致使与会者无人敢撄其锋。此案遂获原则通过。10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川岛提案与外相广田弘毅之“对华三原则案”同时正式通过。此后，日本外交人员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展开“广田三原则”的交涉，而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则在华北积极煽动“华北自治运动”。“水鸟外交”与“老虎政策”*交互运用，相互策应，造成了1935年华北危机。

土肥原贤二的导演与推动

土肥原贤二是惯于玩弄谋略的臭名昭著的日军将官。他1884年生于日本冈山县，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初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后随坂西利八郎来华。1928年任张作霖之军事顾问，张学良继父执政后他被辞退，任奉天特务机关长。^①九一八事变后任沈阳市长，又参与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外国新闻记者称他为“满洲罗劳伦斯”。罗劳伦斯为英国经营非洲的先锋，以此称土肥原，即喻之为日本经营满洲的殖民地的先锋。^②自此以后，如1933年之塘沽协定，1935年之察东事件、强占丰台车站事件、秦土协定、香河事件，以及冀东反共自治委员会等，均由他参与策划与炮制。

1933年，土肥原再度任奉天特务机关长，“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他的任务不只在奉天，而且握有对热河省、山海关、通州、唐山等地特务机关的全部指挥权”。^③此后，他即积极参与策动分治华北的阴谋，成了陆军少壮派中分治中国的有力分子。

- 分别指以缓进的外交方式和直接的武力方式侵华。

① 《日本时人辞典》，第41页。

② 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图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③ 《秘录土肥原贤二》，第283页。

1934年4月18日，土肥原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东京参谋本部提出一份“挽救华北”的机密建议案。他认为，“当前急迫的问题是华北新政权的建立”。依照土肥原的设计，这个“华北新政权”在由李际春、石友三、白坚武等人联合推翻中央政府及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之后建立；领域包括长江以北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绥远与宁夏各省；“新政权”的军队称为“定国军”，其总司令预备推吴佩孚。^①土肥原这个建议案与关东军分治华北的步骤是一致的。

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分治华北制定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要求国民党与中央军队退出，使华北政权成为真空；第二步是选择傀儡对象，使自治实权落入日军之手；第三步是全面压迫南京政府，使其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有指导之地位。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也正是依据这三个步骤进行的。1935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制造河北事件时，关东军认为此时正是实施第一个步骤之好机会，借口热河西南“国境”地带中国方面的反“满”事件愈益严重，于6月11日以电报指示土肥原，令其在最短时间内使宋哲元撤退至黄河以南地区。^②土肥原即强迫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于6月23日签订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察哈尔当局被迫承诺：二十九军部队撤出察北五县，国民党党部撤退，禁止反日团体活动，以及允诺不再向察哈尔北部移民。^③

从河北、察哈尔两省驱逐国民政府势力，大致完成了关东军“华北分治”的第一个步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认为，下一个步骤由华北驻屯军来实行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派土肥原前来。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却称：“由天津军（即华北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建立新政权是妥当的，但其中应包括关东军的

①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判记录，附带文件》，原编号为沈阳机密第122号，审判记录文件编号为1763—A。

② 《秘录土肥原贤二》第266页。

③ [日]岛田俊彦等，《现代史资料》，三铃书房1964年版，第8卷，第491页。

要求，同时为进一步密切两军的联系，特将土肥原借给天津驻屯军。”这样，土肥原就以协助多田司令官的名义来到了天津。^①

1935年10月，土肥原奉南次郎之命来天津，他赴津有两项使命，一为实现华北自治，二为诱使内蒙独立。^②土肥原是个运用谋略的老手，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及制造伪满洲国，故对执行此两项使命，认为并不困难。此次他的计划是：“第一步先说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阎、韩、商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冀东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土肥原认为，殷汝耕是真正的亲日派，说服他不成问题。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这四个人中，土肥原首先看中了宋哲元。他认为，宋哲元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天津、北平这两个华北政治、经济重地，而且最邻近满洲国。如与冀东的殷汝耕携起手来最为理想。”土肥原将此计划上报关东军，批复为：“最迟11月中旬，对宋哲元的工作必须搞出头绪。”^③于是，土肥原就按此计划，再次策动宋哲元。在此之前，土肥原9月来北平时，已要求宋哲元组织自治政府，由日本予以军援经援，为宋哲元所拒绝。此次10月来津时，又向宋哲元要求两项：政治方面，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所任命之华北官员，一概罢免，并控制平津及华北自治之言论；经济方面，建筑津石铁路，修改津海关进口税则，便利日货输入，打击英美贸易。宋亦予以拒绝。^④

土肥原正在积极策划组织华北“自治政府”之时，国民政府突然于11月3日宣布币制改革，这无疑给日本对华侵略造成一定障碍。于是，日本军部便更积极地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乃商妥关东军出兵威胁，并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其内容为：(1) 新政权之名称为“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

^{①②③} 《秘录土肥原贤二》第283、452、290页。

^④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战犯裁判诉讼记录》，第2314、2315—16及2702页。

(2) 领域为五省二市；(3) 首领为宋哲元，总顾问为土肥原；(4) 军事由最高委员会主持；(5) 财政：截留中央在各该省市之关税盐税与统税；(6) 经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为一单位；(7) 金融：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8) 信仰：扑灭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代以东洋主义；(9) 政治：保留南京之宗主权；(10) 外交政策，亲日反共。① 土肥原限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这无异于发出最后通牒，至11月18日，土肥原再次扬言：宋哲元必须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他将“派5个日本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② 他还对宋哲元的代表萧振瀛说：如果宋哲元不在20日前宣布自治，日本方面将自行宣布。③

在此期间，土肥原于11月19日又策动汉奸组织所谓“河北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总会”、“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天津工商业联合会”等团体，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保定商震、山东韩复榘、太原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北平秦德纯、天津程克、青岛沈鸿烈等，要求南京政府开放政权，允许自治。④ 这些所谓“民众团体”还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自治”。⑤ 同时，汉奸殷汝耕所控制的地区各机关、华北新闻公会、各学校也出现了与之呼应的舆论。⑥ 一时间，“华北自治”的叫喊甚嚣尘上。

为了配合土肥原的活动，11月12日多田骏飞往济南会晤韩复榘，13日日军将校团十余人亦至济南访韩，促其响应。韩复榘于11

① 梁敬𬭚：《华北自治运动》，台北《传记文学》第12卷第5期。

②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05页。

③ (台北)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469页。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1辑，第175—176、169页。

⑤ 《新天津晚报》1935年11月20日。

⑥ 《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30页。

月13日乃发表了要求开放政权之通电。关东军更是倾全力与之配合，决定集中兵力于山海关，于12日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发出命令：“命你指挥独立步兵第一联队、战车第三大队的轻战车一中队、野战重炮第九联队的一大队、独立步兵第一中队，于11月15日前在山海关附近集中，准备进入华北，但进入山海关以南则必须根据军部命令。”^①同时，南次郎还命令旅顺口、青岛的巡洋舰、驱逐舰驶往天津大沽口。^②日本飞机则连续侵入北平上空，关东军从海陆空三面向宋哲元示威。

同日，南次郎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发出“关参1.第762号”电报，汇报关东军的意图。电文略谓：此次南京政府突然实行的白银国有及币制改革，“其影响所及，将使与日、满帝国接近并有密切关系的华北地区经济枯竭，更进一步威胁满洲国之经济基础，此已为既往之各种情况所判明，特别是背后有英国大力的支援，英国在中国的支配势力得到加强，此亦将危及多年来确立的东洋永久和平的基础。”“南京政府此次暴举，实为我军断然推进华北工作，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之绝无仅有之良机。”“华北实力人物在驻屯军幕后指导下，正勉为其难阻止白银外流。”“如进一步使其与南京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分离，则需更大支援。”“为此，本职兹以一部兵力集中于满中国境，用以支援华北实力人物，以便使上述政策得以彻底实现。至于有关关内行动，已有慎重、公正之处置，特别对进入停战区域以外，当然必须遵从圣命。”^③从南次郎的电文中，可以闻到强烈的火药味，关东军已经不惜用武力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了。

宋哲元接到土肥原限期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的通牒后，一面于11月11日向国民党中央请示应付方针，一面向将于12日召

① 《秘录土肥原贤二》，第298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1辑，第175—176、169页。

③ 《秘录土肥原贤二》，第298—299页。

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电，要求结束训政，开放政权。^① 11月18日，宋哲元又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说：“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处于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不得不宣布自治的苦境。”^② 此时华北情势遂呈现空前紧张，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锡庚于11月18日报告南京说：“华北新组织因彼方威迫限20日以前实现，否则将自行办理。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难幸免，唯地方尚称安谧。”^③

在华北河山瞬将变色的危急关头，国民政府沉着地进行军事外交应付，并采取了挽救危亡的行动。11月19日，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报告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④ 这表明决不允许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决心。蒋介石作了军事与外交上部署：在军事上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习，集中了几个师，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又准备了许多军用列车^⑤，摆出将要北上华北的态势；在外交上，指令中国驻日使馆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制止土肥原分离华北的行动。当蒋介石于11月19日晚从驻日使馆得悉“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准行使武力”^⑥ 的情报后，立即电示宋哲元，告以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的资格，令立即停止与土肥原间的谈判。^⑦ 与此同时，北平各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等50余人，当面向宋哲元表示，他们一致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宋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

① 《华北日报》1935年11月12日。

② 《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31页。

③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469页。

④ 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编印1981年版，第1册，第1018页。

⑤ 《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

⑥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续编（一），第711、713页。

⑦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469页。

权招致分裂。^①在这种情势下，宋哲元于11月20日让萧振瀛向北平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并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②土肥原逼宋哲元于20日宣布“自治”的计划遂告破产。其后几日内，土肥原虽对宋哲元继续加以逼迫，并怂恿冀东“非武装区”专员殷汝耕于11月24日宣布“自治”，成立“冀东反共自治委员会”。土肥原此一行动，不仅使宋哲元获得拒绝即行宣布“自治”的借口，且触发了华北各大学教授的严词指责以及学生抗日运动的蓬勃开展，英、美两国亦表示严重关切。正是在以上诸种因素之相互作用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应对华北“自治”活动从容进行。结果，为应付日方，中国政府提议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使日本军方期盼的“自治政府”，完全失去了设立的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

谁是分治政策的制定者

1933年至1935年间，板垣、多田、土肥原先后或同时在华北进行分治活动，犯下了对华侵略的罪行，是应该承担侵华责任，历史已作出了判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板垣、土肥原的一贯侵华行为，以控制中国的阴谋和对华实行侵略战争，犯下了破坏和平罪，判处绞刑。^③多田于1945年12月作为甲级战犯被盟军逮捕关押。^④这是咎由自取。但须指出，分治华北的活动，决不是他们三人的个人行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日本军人的“独走”。“华北分治”虽为驻华日本军官所策动，但日本政府不能推卸其分治华北的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有四次分治中国的政策性决

①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652页。

② 《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05页。

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08—612页。

④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138页。

定。斋藤内阁时期有两次。此届内阁是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于5月26日成立的，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任外相，他高唱“焦土外交”，对侵略中国持积极态度。^① 6月临时阁议即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案。^② 8月27日，又通过了《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时局处理方针》，首次明确提出，对中国本部的政策应和对“满蒙”的政策“在本质上有所区别”，要利用中国内部的“独立倾向”，实现侵略中国本部的目的。^③ 正是在斋藤内阁决定分治中国政策之后5个月，板垣才被派到华北进行分治策动的，可见板垣的活动不是他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贯彻日本政府对华政策。

斋藤内阁为了满足军部的侵华要求，于1933年10月21日又通过了陆军提出的《帝国国策》。其对华政策的基调是，大力培养和组织亲日分子，特别要制造中国分裂的倾向，以建立广大的亲日地域，使其在对第三国作战时，至少在开战初期保持中立，在不得已时要在华北建立缓冲地区。^④ 此国策是向日本驻华军队重申对华分治政策不会因《塘沽协定》签订有所改变。在这一国策指导下，关东军、华北驻屯军更加积极进行“华北分治”的侵略活动。

随后的冈田内阁时期，也有两次分治中国的政策性决定。此届内阁于1934年7月8日成立，所奉行的政策基本上是斋藤内阁的继续。内阁全体成员客观上是受军部“统制派”支配的。^⑤ 广田弘毅任外相，标榜“和协外交”，高唱“中日亲善”，其实际含义则是要求中国和列强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进而要求承认日

①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

② [日]藤原彰著，伊文成等译：《日本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卷，第37页。

③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日本国际联合会1955年版，下卷，第206—210页。

④ 《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2页。

⑤ [日]日本现代评论社编，孙雷门等译：《昭和宰相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本在中国的独占权益。^①同年12月7日，冈田内阁制定了《对华新政策》，除规定向全中国进行侵略与扩张外，强调加强逐渐吞噬华北的行动。其分治方法是，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的统治，扩大《塘沽协定》，在华北驱逐排日组织与撤退国民党党部，等等。^②新政策表明，日本将着手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实现“华北分治”。在《塘沽协定》后，日本政府精心策划一个包括经济侵略的侵华政策，作为最高国策付诸实施。新政策使日本侵华进入一个新阶段。1935年，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在华北制造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迫使华北地方当局签订所谓《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就是这新政策的具体化。在新政策执行的关键时刻，冈田内阁为了满足军部的要求，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此案要求中国政府将“北方一切有害于日满华亲善关系的因素必须铲除”，否则日本将坚决“使华北与南京分离”。^③1935年第4季度，华北驻屯军与土肥原制造“华北分治”活动，正是在此案鼓励下进行的。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每一次分治中国政策的决定，都是适应军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要求，也都成为板垣、多田、土肥原等人策动“华北分治”活动的出发点和推动力。可见板垣等人的策动，根源在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是“华北分治”的主谋，东京是其策源地。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与日本军人的冒险行动，相互配合。当“华北分治”政策失败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终于用武力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正如日本外交家重光葵所说的：“进行华北工作，终于诱发了中日战争，变成了引导日本崩溃的导火线。”^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① 《简明日本近代史》，第292页。

② 《现代史资料》第8卷，第14—15、22—24页。

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帝国大事记》第4卷。

④ 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